



中国华侨华人学 ——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主编 李安山 副主编 吴小安 程 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中国华侨华人学

——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主 编 李安山

副主编 吴小安 程 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李安山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

ISBN 7-301-10105-8

I. 中… II. 李… III. ①华侨—研究—中国—文集②华人—研究—中国—文集 IV. D634. 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690 号

书 名：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著作责任者：李安山 主编

责任编辑：胡利国

标准书号：ISBN 7-301-10105-8/C·039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7.125 印张 2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言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学科转型的根本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教育与学科的恢复重建,新兴学科的出现与传统学科的研究规范与标准日益提高。前期,学科转型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基本队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架构与体系等初级水平上的重建、组合和培养,反映在全社会对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新风气的渴望与追求。对外吸收引进与对内批判反思,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社会文化和道德重建的主要内容。后期,学术界的转型开始围绕学科规范、学术创新、研究质量及与国际接轨等方面进行检讨调整。这既是中国学术水平逐渐提高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社会的巨变、对外交往的频繁和知识创新的必然要求。

不容置疑,中国现阶段教育科研水平与社会经济的巨变和全球化激烈竞争的现实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的有关未来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第一,在政府决策层上,强调“科学的发展观”;第二,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意义;第三,强调人才特别是专门人才的重要性。这三个重点集中指向与学科研究和教育培养息息相关的问题,即方法论、专业理念、管理规范 and 知识创新的战略制高点;也是在检讨和评估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种种问题教训、瓶颈制约、差距要求等基础上得出的科学判断。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检讨,需要创新,需要科学规划,从而提升政府决策管理的水平、完善科研教育与社会文化体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那么,新形势下的华侨华人学科如何定位?学科面临着什么问题?存在着何种挑战?这些都是急需检讨和评估的重大课题。

华侨华人研究的热潮,根本上源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社会巨变以及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的崛起。颇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热潮首先是在外国政府、商界、智囊团和学术机关的推动下才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的。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始终受到两大因素制约。其一来自源头,受“中国中心论”的支配。其二来自现实,受所在居留国现实利益考量。本质上,如果华侨华人成为“问题”,此即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其中中国要素作用力更大。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分别在两大结构性要素影响下,研究潮流一直与时并进、日新月异;不同时期呈现出各有侧重的特征。起初,问题围绕着同化与融合,强调国际、国内政治安全;此后,注意力转移至研究华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目前,学者更专注于华人网络跨国化作为东亚一体化之引擎,或华侨华人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华侨华人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机制层面上,中国有“五大侨务机关”,这在全世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历史层面上,华侨华人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影响深远。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国家统一等问题上,华侨华人一直是最积极、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第三,现实作用上,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南亚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贸易网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大中华经济圈”的进一步整合,东亚一体化与全球化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华侨华人问题,早已突破了几十年前传统“侨乡”等狭隘的地域联系和单向作用,其分布与格局已明显多元化,并呈现出传统意义上的旧移民及后裔回国观光投资与 80 年代新技术移民归国创业的双向回流态势。

中国的巨大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移民人数的增加、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以及各种商业网络的出现,为华侨华人在世界经济领域展现自己能力提供的舞台和机会日益增多;华侨华人在移民和定居他国的过程中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华人在居留国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积极性日益提高。无论是作为某个居留国的少数民族,还是作为“海外华人”,还是作为整体的“华侨华人”,上述这些重要现象都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

进程中的积极因素。约翰·奈斯比曾在其未来学名著《亚洲大趋势》中预言:21世纪是以中国为主、以海外华人网络(overseas chinese networking)为主的新世纪,并认为这是21世纪的主流^①。虽然这种预言的真实性尚需实践证明,但它至少说明了海外华人在新世纪的重要位置。

在文明面临着“特化”危险的今天,文化多元已经成为一种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需。华侨华人正在以自己的生活实践着文化多元和文化共存的哲学,他们在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在接触、容忍、了解、欣赏、吸收其他文化。李亦园先生指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大致都要保持其基因特性的多元性,避免走入‘特化’(specialization)的道路,以免环境变化而不能适应。……西方文化的发展已有‘特化’的趋势……”^②华侨华人的各种日常活动似水银铺地,正以其特有的方式防止这种“特化”。他们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同时又以谦和的态度吸纳着世界文化的精华。

二

《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是2003年9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讨会的论文集,也是由李安山教授主持的教育部2002年人文社科重大课题“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的成果之一。

为什么论文集题目中要用“华侨华人学”?

“华侨华人学”这一术语有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华侨”与“华人”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两者的国籍身份也不一样。然而,两者相通之处甚多,例如起源地的相同,历史上的延续,研究中的互通,身份上的互换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实际上,这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正是与两者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与文化认同的某种不确定性有着

^① 该书第一章标题为“国家式微:全球网络兴起”,文中出现的“华人网络领风骚”、“华人势力遍布全球”、“新崛起的经济强权——华人”的提法颇为醒目。参见约翰·奈斯比·《亚洲大趋势》,林蔭庭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年版,第2—44页。

^② 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许在全主编:《泉州文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直接的关系。至于“学”，既可以指一门专门学科，也可指以某一特定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华侨(华人)学”的提法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却已为国外学者所采用。2002年底，爱知大学曾邀请日本及海外学者对“华侨学”的构建问题专门举行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议主持人虽然明确表示“‘华侨学’这一说法本身在现阶段既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也未作为学术界的常用语而固定下来”，是一个“含义未定的词”，但讨论却正是以“华侨学”为题展开，论文也以“围绕华侨学的构筑—其视角及若干方法”为题正式发表^①。我们所从事的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正是在于改变华侨华人研究目前所处的学术边缘状况，提升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地位。

为什么要在“华侨华人学”前冠以“中国”二字？考量大约有三：其一，总结中国学者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中国学者的努力目标。课题组尝试就整个中国学界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反思。虽然我们不敢奢望解决问题，但我们却在努力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和回答问题。其二，强调华侨华人研究的中国特色。这不仅因为华侨华人与中国同祖同宗、血脉相联，始终为华侨华人研究关注的中心点；而且因为中国有“五大侨务机关”，全世界独一无二。其三，文集收录的论文作者全部为中国大陆学者，而非海外学者。因为各种原因，港台学者亦未能在编之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值得庆幸的是，香港与台湾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文集有专文论及，算是弥补。

此处界定为“中国华侨华人学”，实不敢妄称涵盖国际、海外、或整个华侨华人学。这既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也表达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者的一种希望。

本书共收论文十三篇，学者主要来自北京、广州和厦门，内容分三部分：(一)学术意识与学科定位；(二)学术回顾与研究经验；(三)学术批评与资料建设。如何定位华侨华人学？华侨华人学科建设是否可行？三组学者、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组论文分别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肯定了华侨

^① 参见王康武、斯波义信、滨下武志、陈天玺、曾纛、高桥五郎：“華僑学の構築をめぐる一その視座といくつかの方法”，《中国21》，Vol. 17（2003年11月10日）。

华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郭梁强调华侨华人学的中国特色,指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应加强学科意识,在吸收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发展自己的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梁英明认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使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可谓“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反过来,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则可以进一步规范、促进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弥补现阶段种种缺陷与不足。第二组论文从学科定位的角度出发,从学理与分类方面,论证、界定和规范了“华侨华人学”。梁志明认为,华侨华人研究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专门的术语,开始形成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其理论体系固然不成熟,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将日趋完善。李安山的论文从国际学术界传统学科体系的分解与整合的角度,就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局限性、可行性、研究定位、辨识标准、研究范围、挑战与机遇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李安山承认,从传统的学术分类看,由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无法进行科学抽象的特征,华侨华人研究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学术史的演化同时表明,一些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日益独立出来,这又为华侨华人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第三组论文指出华侨华人学科定位与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程希论文强调,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应注意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华侨华人的“特殊性”与研究其他国家社会族群与移民的“共性与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吴杰伟则指出,华侨华人学科规划必须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应随中国与世界的的大环境和相应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在方法论上如何解构、建设华侨华人学呢?五位学者分别从学术回顾与研究经验的双重视角对此提供了生动的阐述和诠释。吴小安和王春光以海外田野调查研究的亲身经历,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反思。针对目前华侨华人研究“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和“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的“三无”研究模式,吴小安指出,华侨华人研究与移民、种族、同化、劳工、贸易、地区互动、国家形成和社会变迁等大的主题、大的范式、大的结构和大的进程密不可分。他根据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围绕华侨华人研究、东南亚研究和槟城

——吉打华人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研究等三个层面，呈献了一个情景化实例和注解。同样，王春光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巴黎温州人研究为例，介绍了他本人的研究体会。他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华侨华人个案研究的经验资料深度与更大的理论主题探讨的重要性。袁丁和曾少聪的论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交叉、相互印证的角度，为华侨华人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优秀的、值得仿效的研究样板，预示了中国华侨华人学界将来应努力的方向。袁丁认为，中外学术史的发展表明，华侨华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单一学科的专利，而是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在强调多学科视角的同时，袁丁特别指出，研究方法与手段、理论架构的创新在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曾少聪从民族学的视野详细地评述大陆、台湾、香港近五十年来海外华人研究。他指出，港台民族学界长期关注海外华人研究的传统与大陆民族学界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才开始重视这一领域形成强烈反差，发人深思。丘立本的论文，则从时代的观察高度，非常感性地提出了本人长期研究的几点心得。对华侨华人研究停滞不前、没有创新的困境，丘立本表达了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意识。

最后，从学术批评与资料建设的角度，高伟浓和周南京分别指出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两个基础性问题。两者一虚一实，相互呼应，为本文集划上了暂时的句号。高伟浓揭示出学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瓶颈与硬伤。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的特有问題，而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存在的结构性、制度性的根本问题。学术批评既涉及学术评估、激励环境与机制，更是包括研究选题、开题的出发点与终点。资料建设，就华侨华人专门领域来说，诚如周南京所言，“既丰富又贫乏”。“丰富”，既指很多尚未发掘的一手资料。所谓“贫乏”，则是指大量重复、肤浅的二手资料。更重要的是，背后揭示的是研究手段、过程及方法的朴素、粗糙与浮躁。

可以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一方面呈现出雨后春笋、百花齐放般的繁荣，另一方面却是低水平重复、贩卖转引与重新包装的景象。这种矛盾发人深省。从表面上分析，华侨华人研究的水平还不高，我们对国际学术界还缺乏进一步了解。从根本上说，我们学术界

骨子里依然背负着沉重的政治文化遗产的包袱。当然,这不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无视问题、拒绝检讨的理由。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

三

中国华侨华人学如何定位?我们认为,中国华侨华人学是一门多学科综合的社会科学门类。

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归类在国际国内一直存在着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在国际上,这一研究通常划归于涵盖传统学科专业门类的院系,如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或跨学科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如亚洲研究、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甚至中国研究等。这意味着华侨华人研究往往是多学科、跨学科专业、人员、资源和方法的整合。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合并未替代或是试图替代传统学科专业或院系。进一步说,无论是跨学科的区域研究院所,抑或是专门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其宗旨是为华侨华人研究学者与研究生合作、交流和培养提供更高一级的平台和条件,为本科生设置的华侨华人相关课程的教学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东南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华人以及华侨学者,为了发现他们自身所在的社区,为了研究本民族的移民历史,从各个学科对华侨华人进行了研究。他们在用不同方法研究华侨华人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这是华侨华人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起到桥梁作用的一个典范。

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门所的人员背景大多为历史学专业,研究也曾大多集中于与历史相关的课题。此格局之形成,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华侨问题从一开始即与历史相关,它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然后才与其他方面或学科发生联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华人研究的第一个专业团体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这主要为历史学家的推动所成,无疑为历史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提供了先机和条件。再次,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1949年以后曾长期被压制,学科专业或被废除,或被闲置;专家学者或遭批判,或被打倒。这样,历史学这一涵盖面极广的学科就不得不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这一学术

范畴的研究,尽管这已明显超出自己的权能。

必须强调,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并非历史学家的专利。相当多的学者特别是早期旅居外国或留学外国的中国学者曾从多方面研究华侨社区;一些历史学家在探讨华侨华人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可以说,华侨华人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特点。此特点在今天的华侨华人研究中尤显突出,这可以从本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得出来。

华侨华人研究既是一个历史课题,又是一个现实课题。

中国人移民海外,最早日期已不可考。从“华侨”一词在清末出现以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从未停止过。虽然清代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多以观察描述为主,但这种中国学术传统的自觉意识是不容否认的。学者们以经世治用为原则。对他们来说,清王朝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中华民国时期,学者对华侨的关注和研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基准。他们对华侨问题的关心是出于对中国内忧外患命运的关心,他们所关注的华侨问题,是华侨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华侨所起的作用。华侨在国外遭受歧视性待遇,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华侨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受到学者们的赞赏;华侨在经济或政治上取得骄人成就,学者们为之振奋。

华侨华人研究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曾有人认为华侨会消失,然而,现实表明,华侨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新华侨移民国外,有的是以留学途径到海外求职并定居下来,有的以打工开路,然后以适当方式在国外安家;还有的则是通过其他途径,只要能在国外留下来在所不惜。这样,仅从出国这一看似简单的方面来说,华侨华人牵涉的问题已相当复杂,如劳动力迁移、智力外流、资本转移、人权法律、妇女作用、双重国籍、侨汇侨资、国际关系、华文教育、文化认同、商业网络等等。目前,对外移民(包括劳工、技术、贸易移民,留学热潮及非法移民)的势头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在人数的规模、迁出地与目标国范围与移民频度方面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移民流向和谋生方式更趋理性。这种复杂性自然而然地为学者造就了研究的空间。

从历史看,一些针对中国的奇谈怪论均与华侨华人有关,如“黄

祸论”的鼓噪即与当时中国移民海外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对中国发展心存疑虑或戒备的人提出各种理论,“华人联邦说”、“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与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一定关联,“隐形帝国”、“经济超级大国”和“新亚洲皇帝”等称呼与海外华人和中国的联系直接有关^①。然而,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有许多华人企业在中国或东南亚地区投资经商,但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赚钱,而非中华意识使然,此其一。虽然华人经济实力已有相当规模,但他们并未构成一个巨大的有内在联系或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外华人网络,此其二。海外华人的财富的总量巨大,但这些财富并未具备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条件,此其三。当然,这些华侨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作为和贡献、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今后的走向和作用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思路。

华侨华人研究既与中国有关,又是国际问题。

华侨华人源自中国,又以各种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以保持中国文化为荣。所谓“独特机遇论”的“独特”,应该不是体现在人数上,因为很多国家存在着大量海外移民,有的国家的侨民比中国更多^②。这种“独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以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做出的各种贡献上。华侨华人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史(或海上交通史、中西交通史)的一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往往集中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

华侨华人研究又是国际问题。在移民早期,契约华工曾在秘鲁、

① Sterling Seagrave, *Lords of the Rim: The Invisible Empi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ew York: Bantam Press, 1995; George T. Haley, Chin Tiong Tan & Usha C. V. Haley, *New Asian Emperors, The overseas Chinese, their strate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8; Murray Weidenbaum & Samuel Hughes, *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Aihwa Ong & Donald Nonini,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② 参见周南京:《华侨华人问题概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7页。

美国、古巴、墨西哥、南非等地遭到不公正待遇,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政策迫使中国政府不断进行抗议和交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住在东南亚的大量华侨华人曾引起居留国政府的担忧,中国政府因此放弃了双重国籍的政策而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交行动。尽管如此,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仍屡屡遭受歧视和迫害,中国政府也多次对他们的这种待遇表示关切。在有的国家,已经入籍的华人在政治忠诚问题上不时受到政府当局的置疑。“华人因素”往往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相邻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当然,从积极方面看,华侨华人历来扮演着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的桥梁作用,也往往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华侨华人研究既涵盖实际问题,又包含理论问题;既需要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又牵涉到细致入微的政策研究;既有文化层面,也有经济内容,又有政治内涵;它还涉及到社会、宗教、民族等其他方面。

涉及学科性的复杂、牵涉面的广泛以及时间和空间涵盖面的延伸,似乎为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定位造成了各种困难。然而,从积极的方面分析,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将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建设看做是修建一栋大厦,以上因素就成为未来这座大厦的建筑材料。可以说,这些因素为中国华侨华人学造就了各种奠基石,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多学科的联系和整合不仅可以从方法上活跃华侨华人研究,还可以从人员配合、资料来源、分析角度等方面对华侨华人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华侨华人学只有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华侨华人学也只有的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中才能真正形成。

是为序。

李安山 吴小安 程希

目 录

序言	李安山 吴小安 程希 (1)
----------	----------------

学术意识与学科定位

建设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有关学科基本问题的

几点看法	郭 梁 (1)
试论华侨华人学科的形成与定位	梁志明 (13)
水到渠成 实至名归	
——略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	梁英明 (26)
中国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李安山 (36)
华侨华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	
“学科建设”中的定位问题	程 希 (63)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吴杰伟 (82)

学术回顾与研究经验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

视角与经验	吴小安 (89)
从学术史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发展	袁 丁 (109)
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	丘立本 (120)
民族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	
——两岸三地民族学的海外华人研究述评	曾少聪 (132)
有关社会学在华侨华人研究学科化建设中的	
一点思考	王春光 (151)

学术批评与资料建设

浅论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批评	高伟浓 (156)
关于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资料	周南京 (171)

参考文献	(187)
------------	-------

后记	(205)
----------	-------

作者简介	(207)
------------	-------

建设中国的华侨华人学： 有关学科基本问题的几点看法

郭 梁

随着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活动的迅速增多、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成果的积累,学界对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关心度和兴趣日渐增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2—2003 年重点课题终于也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列入其中,使这一研究成为有组织、有规模、有保障的研究,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然而,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都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华侨华人学”的命题虽已跃然纸上,但是,对于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华侨华人学应该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以及华侨华人学应该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目前尚无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即使对于要不要提出华侨华人学一事,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一致。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下面就有关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积累

学术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石,任何新学科的命名都是学术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史来看,也有着学术的传承、批判与吸收、创新的过程。从 20 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开始,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其间曾经历过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发展

期,以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一批学者为代表,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和国际移民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中期以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在封闭的条件下也开展了华侨研究工作,在华侨出国原因调查、契约华工调查、近代华侨对中国投资史的调查以及译介外国相关研究著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传承和拓荒之功不可埋没。改革开放后,由于研究大环境相对宽松,更由于开放后出现的新形势提出了诸多研究课题,以及受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东西方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在新形势下出现了空前发展的新局面,进入了它的高潮时期。

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一幅崭新的研究图景已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化大革命”前华侨研究成果的“三多”、“三少”现象(即“外国的多,中国的少;台湾的多,大陆的少;历史的多,现状的少”)已有根本的改观。那么,“新图景”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 从现象上看

1.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多(包括专业研究人员和业余研究人员)。除了原有的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外,改革开放后又陆续建立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随之壮大。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和专业队伍,是学术积累得以进展的重要条件。

2. 研究活动多。各级各地华侨华人历史学会或研究会纷纷建立,各类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项目也先后开展,国际性、全国性和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多次召开,出国、出境参加华侨华人研究工作和学术会议的学者络绎不绝。这样的交流过程,贯穿着学术对话,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同行间的学术成果的吸收、批判或传承,推进了学术积累和创新。

3. 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多。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后仅国内出版的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专著、编著、译著、论文集和资料集等达二